



跳出框外

撰文 鄧詠筠、劉修彤
攝影 方保山、劉慈章、Crystal Lee、Fitz Suen

從古至今，靈感女神孕育出不少偉大的藝術家，女性在藝術作品中從不缺席。

不論是波提切利 (Sandro Botticelli) 的《維納斯的誕生》、達文西的《蒙娜麗莎》、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的《瓦平松的浴女》、Burne-Jones 的《金色樓梯》、Marcel Duchamp 的《下樓梯的女人》等，女性的千嬌百媚在畫框之內活靈活現。

然而，在畫框之外的凡間裡，能夠透過藝術作品留芳於世的女性藝術家，又有多少人？

根據瑞銀於3月初發表的藝術市場報告，在史上100大拍賣作品中，出自女性藝術家之手的只有兩幅，而以女性作為描繪女神的畫作卻在這100大作品的首25個作品中佔多達一半。

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價格，亦遠遜同儕。根據MutualArt資料顯示，於2017年排名前100名的13位女性作品銷售額一共為2.63億美元，僅佔總拍賣價格的7.4%。由藝術網站Artnet與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 的調查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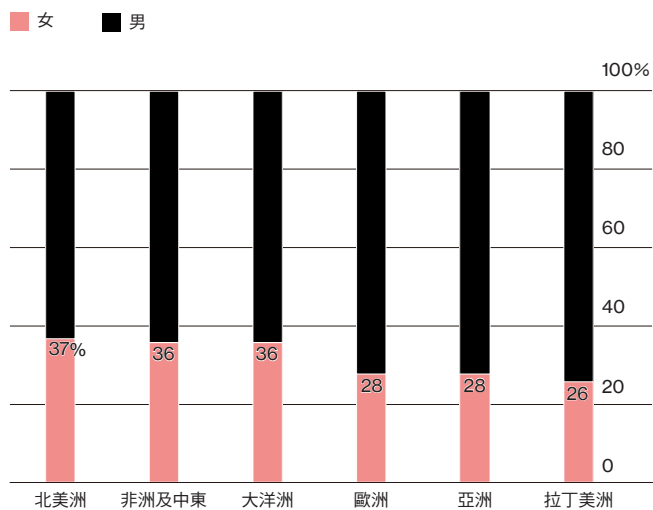
出，女性在整體二手市場的比重只有11.6%，一手市場則是13.7%。除了藝術家外，藝術界內不同崗位，亦由男性主導。這一切既是歷史留下來的沿革，亦因社會結構與觀念的形成。

雖然如此，男女不平等這情況在藝壇正在慢慢地出現轉變。根據Artfacts.net資料，全球展覽中的女性參與比例已經從2000年的25%，逐步上升至2018年的33%。各大機構如博物館、畫廊、院校等，都意識到性別平衡的重要性。有關加強關注女性參與的討論亦於近年興起，Saatchi Art最近就推出了「Refuse to be Muse」(拒絕當繆斯)的活動。加上女性億萬富翁的崛起，同時推動女性藝術家作品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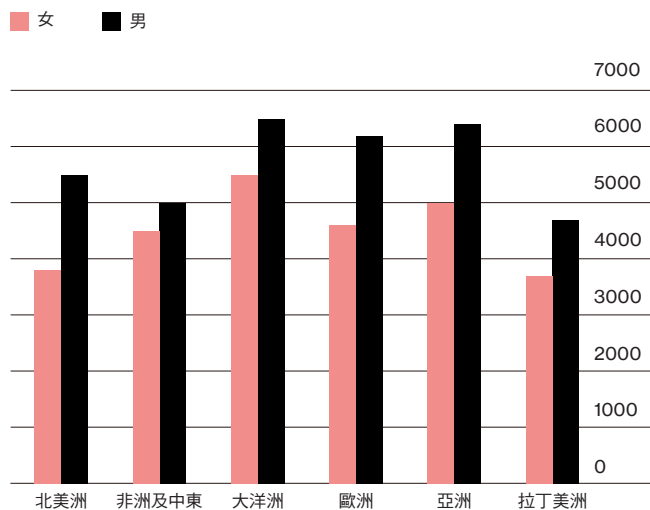
今次專題找到來自畫廊、藝術館、藝術贊助企業的女性，以及藝術家，以不同角度分享她們參與藝術的經歷以及對於藝術界的看法。就讓繆斯女神走出畫作的框框，雙腳踏到現實，拿起畫筆與工具，塑造屬於自己的作品，讓繆斯成為自己的繆斯，親自主宰自己的命運。B



女性藝術家的佔比偏低
(1999年後)



女性藝術家作品售價遠低於男性作品
(1999年後作品)





雕塑家 林嵐

香港做雕塑的藝術家非常少，女性更少，如果在網絡上搜尋女性雕塑家，五根手指頭就數得出來。林嵐 (Jaffa Lam) 是雕塑界的稀有動物，她說，「雕塑界的性別失衡從教育一路延伸到職場。老師、主管、老闆都是男性。他們買的機器很巨大，做傳統的木刻要求力氣與重量，所以你會覺得，我要長得跟男人一樣強壯我才能夠做雕塑。」但林嵐不甘被軀體所困，她創造了自己的語言，用可拆卸的部件製作大型混合媒

我的作品都是女性的

March 20, 2019

介雕塑作品及裝置，將木頭的線條刻得溫暖、彎曲，她說：「我的作品都是女性的。」

別人常說林嵐的雕塑作品裡面有一種詩意，她回應：「我覺得那是山水的詩意，可遊、可居、可駐留。」她將她的柔軟歸功於在香港中文大學求學時期的師父張義。張義從來不在工作室上課，他們中午去陸羽茶室、下午去神州書店、晚上去沙田凱悅酒店樓上的酒吧，林嵐黏著張義三年，每天說雕塑。「比如說我們去陸羽吃芝麻糕，我覺得芝麻糕的抖動很可愛，然後張義就會拿起芝麻糕放在我面前，說這種東西最吸引人。現在想起來，我覺得他在說雕塑作品的體積、質地、動態與展示。」林嵐說她很感謝張義：「他沒有要我成為一個傳統的、很陽剛的雕塑家。」

林嵐認為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跟女性有關的」，像是《許願樹》。「許願樹我覺得是很女性的，因為你要許願你會向天后娘娘、觀音許願，是比較溫柔一點的東西。」林嵐的作品線條也一向溫暖，不是很剛硬的，像用回收水管製成的作品《我在聽，心在跳，手在動》也是把水管做成彎彎的、婉若的。

「傳統的男性作木刻，是腰間有一堆工具，站在木頭上用自已的重量把木頭壓住，但你看我的東西都是可以拆的，而且拆開後全部都是我可以負擔的重量。男性不會這樣想，所以我的作品都呈現出我是一個女性。在我自己設立的工作室，我也一定會幫女生買適合她們的器具，起碼讓女生不要怕雕塑，而且我會教暖雕塑，比較輕盈的東西，像是布、織品。」林嵐一路以來很小心地去塑造自己「女性雕塑家」的身份，如果她去走像男性雕刻家一樣的路，一定會在藝術創作的路上受到很多限制。

林嵐也常常跟不同界別的女性工作者合作，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合作是她最為人知的其中一件作品。「我12歲開始在織衣廠裡面剪線頭。當時賺最多錢的不是我們，是車衣女工，那些女工都青春貌美、動作很快、賺錢多又有休息時間，我每天去工廠都很羨慕，覺得我以後要成為這樣的女孩，」林嵐說，「但後來我就做了藝術嘛，2008年那時候我剛從紐約回來，覺得藝術沒什麼好做，我就去了女工會看看我的朋友，她們是車衣服的。我不久就發現，她們很苦，因為紡織廠搬離香港，她們因此賺不了錢、找不到工作，有一些更遇上家暴、老公對她不好、包三奶等，我覺得很可惜。」於是2009年，當林嵐第一次收到國外的展覽邀請，「在德國那邊，還收到了artist fee（藝術家費用）」，她就想，不如拿這些錢請他們做吧。「所以這樣完成了第一件作品《降落傘》。這是後來《微觀經濟》（Micro Economy）計劃的起點，好像一個小社會的經營，將夕陽產業跟藝術工業接起來。」

林嵐經常透過作品為香港女性發聲。後來她很關心家庭

婦女，去年，林嵐以合作伙伴方式在2018歐洲藝術宣言展上展出一面婦女旗。發起這個計劃的藝術家想在世界各個地區call for flags，為弱勢社群發聲。「為什麼是旗呢？因為你揮舞這個旗子，就好像在為他們搖旗吶喊。他問我香港最應該為誰發聲？我就想，是家庭主婦。」林嵐說，她與很多勞工合作，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會為勞工婦女發聲，會上街為清潔工人爭取合理工資，但沒有人會為家庭婦女爭取合理工資，因為她們的勞動是隱形的。在家裡帶小孩地位很低，會被人看不起，她最多就是孩子的媽媽。「我總覺得好像不只香港，女性不去工作，在家裡做家務、帶小孩，從來不被視為勞動，所以我覺得不只為勞工出聲，也要為這些女性出聲。」

林嵐說，作為一位女性雕刻家，因為性別而有不同待遇的現象在教育裡面比較明顯。「男學生常常會挑戰我們這些女老師，但是看見男老師的時候就乖乖的，不會挑戰，不會問一些很難聽的問題。比如說看我沒結婚，就問我是不是女同志，或是在我嚴厲批評他們的時候，在走廊上很大聲地喊老師妳更年期了嗎？我覺得這是很歧視的，是語言的暴力，你不會這樣問一個男老師。」

她認為這是結構的問題。沒有足夠的自覺也是一個因素。「當我們談論女性議題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香港已經很平等了，你還講這些有的沒的做什麼？你看我們有一個女特首，還不公平嗎？但你會發現，女性受攻擊的時候，別人是攻擊他們的頭髮、妝容，你是以她的外貌作為工具對吧，沒有人會攻擊梁振英說，你為什麼長得那麼醜。」

浸大視覺藝術院副教授兼課程主任Peter Benz去年發表了一份名為Creative Livelihoods的研究報告，抽樣調查2001年至2015年藝術系及創意媒體系畢業生，發現平均71%畢業生是女性，但女藝術工作者有86%中途離場。林嵐作為一位老師，也觀察到了這樣的現象。

「我跟學生說，芝加哥女子藝術學校於開校前在報紙上刊登招生簡章，很多女孩子聽到有這樣的一間女子藝術學校，馬上就報名了。但是當時這個學校還沒蓋起來，開課的第一天，他們到校門口發現學校還沒建成，創辦人跟他們說：『你們覺得這個世界上無端端的會有一個女子藝術學校嗎？沒有，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建立一間。』所以那個學校的校舍全部都是第一屆學生蓋的。」

林嵐認為，解決性別不平等要回歸到廣大的、普及的教育裡面。「如果你從小就明白，女性是可以出聲的，而且你也關注自己的身體，你就會說，我提不起那個工具那又怎麼了，我可以找一些小工具呀。我現在一定要讓自己生存下去，而且要活得很好，無論如何也要做藝術。是爭一口氣。我的生存根本就是一個證明，證明就算這樣我也可以做藝術。」**B**

為社會帶來

大館當代美術館

展覽策展人 譚雪

個位於城市中心的當代美術館中，譚雪不斷找來更多能夠為這個城市帶來「腦震盪」的展覽。最近，大館當代美術館便邀請了法蘭克福現代美術館館長Susanne Pfeffer策展，舉辦『表演社會：性別的暴力』，探討結構暴力的社會問題。

全球藝術圈的男女比例都處於失衡的狀況，經過多年來的女性運動，不同的時代仍然存在不同的相關議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我讀到一些調查顯示美國美術館機構有存在男女工資不平等的現象。據我觀察，近年來歐美的當代藝術機構對該不平衡性有強烈意識，我們美術館的每個展覽也會特意留意男女比例是否平衡，盡量是各佔一半的。」譚雪分享，今天社會有這意識，因為前人在過去20、30年的努力，但現在仍未達到完全平衡。「藝術行業的系統及市場結構仍然未有變動，但是很多策展人與畫廊家現已調高警惕，」她說。

事實上，這個現象不僅存在於藝術圈，在所有產業都有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主要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譚雪分析：「一直以來，以父系社會的家庭結構，讓女性從傳統意義上，被視為照顧者的角色，藝術圈亦有受到這樣的投射。在職場上，一位女性如果結婚生子，就會被視為比男性能力弱，這是非常偏見的看法。」她以去年底美國一個頂級當代美術館爆出的醜聞為例，有一個策展人本來獲得聘用，「但後來美術館的管理層得知她懷孕後，就取消了聘用。我很敬佩她勇敢地將這經歷公布出來，讓行業人士和機構對女性歧視的問題給予很多關注。我們需要有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女性分享經歷和感受，如當代藝術的特性之一——讓人們對所處世界發出疑問，進而產生更多的敘述。」正因有女性勇於把這問題說出來，行業才開始越來越關注。

大館現在正在做的《性別的暴力》展覽，正是探討女性在社會中面對的無形「暴力」。「《性別的暴力》探討的並不是我們馬上會聯想到的家庭暴力或肉體暴力，展覽首要關注的是女性本身，她們受到社會和家庭的期待，要成為特定的角色，以致對自己的對抗與限制，所產生的痛楚，」譚雪說。展覽中的作品透過直接、強烈的表達方式，對於女性面對的結構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提出反思。「第一件作品回應了幾百年以來男性主導的藝術世界，甚至有知名男性藝術家評論到：『女人畫得不好。』，藝術家Pamela Rosenkranz以幾乎自虐的行動去回應該言論。藝術家在服壯陽藥物威而鋼(Viagra)之後，創作了一系列『行為繪畫』。」譚雪解釋，裝置內包括作畫時的殘跡雜物，讓人可以感受到藝術家與這所謂的「陽剛權利」的搏鬥。事實上，現年81歲的德國著名藝術家Georg Baselitz過去曾多次公開表示，認為女人無法畫出好的畫作。

另外，藝術家Jana Euler的《上樓梯的裸體》由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女性在繪畫中的形象。「如Marcel Duchamp知名的

去年底，當代知名女藝術家曹斐在香港大館舉行亞洲首個大型個人展覽「在過滿的世界挖一個洞」，利用大館作為前監獄、警署及法院的獨特歷史背景，緊扣整個作品，好評如潮。最近，在展覽中的重要作品《監獄建築師》更獲選於全球矚目的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論壇延展」(Forum Expanded)中放映。

大館當代美術館展覽策展人譚雪便是該展的策展人。想起那次合作，譚雪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藝術家是一群很特別的人，他們每個人的思維都很不同，因為他們的存在，我們可以在作品中思考到現在生活所面臨的問題，」譚雪說。在這



「腦震盪」

畫作《下樓梯的女人》、Gerhard Richter 的《艾瑪》。以及在大量電影、戲劇作品中，女人作為一種令人驚歎 (spectacle) 的形象由樓梯上走下來，面對所有人的注目，」譚雪說，而 Jana Euler 在作品中大膽地描繪了她本人以裸體的形象走上樓梯，上升離去的姿態去回應「下樓迎歡」。

事實上，女性主義不僅存在於藝術圈。「在70年代是對反抗性別歧視和性的解放，這存在於藝術、音樂、文學等各個領域，」譚雪說，這次《性別的暴力》的創作人不再談論對性別的解放，而是很多關於身體及身份的討論，女人身體的功能性，以及社會對於女性角色認可的差別。「現在亦有『第三性』，也需要平等的對待，現時社會對他們的接受度遠遠不夠，他們仍然處於很邊緣地段，這是超越了男女平等的討論。」譚雪分享。

雖然香港整體社會傾向於保守，這個主題對於香港人來說很合時宜。「香港很多優秀的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在處理這個議題。亞洲極端消費主義的文化氛圍，社交網絡的崛起，營造出一種『自我影像的癡迷』。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網絡形象的痴迷塑造，女性對形象維護及培養的投入，其實這些精力是不是可以放在其他方面？這是一些可以探討的話題。」

預備每個展覽時，譚雪都會思考它與香港有一個怎樣的關係，跟大館、觀眾，是否有共鳴。「《性別的暴力》帶來對性

別問題的即時討論，在亞洲區罕有。大館將這個話題帶入與公眾的討論，也標示了我們機構的前瞻性，勇敢地討論一些『難言』主題。」另外，同時在展覽的《疫症都市》亦是討論關於香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也呈獻了相關中區警署的歷史資料和研究。「去年曹斐個展《在過滿的世界挖一個洞》，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新作品《監獄建築師》的靈感來源於大館歷史，等等。大館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它曾是包括警察總部、法院、監獄的一條龍服務的懲戒機構。」譚雪說，每一位藝術家、策展人，來到都會有非常強烈的感觸，這個話題並非可輕易避開的，已經有沉重的歷史感，藝術家很自然地融入在創作中。

「10年前，香港沒有 Art Basel (巴塞爾藝術展) 與其帶來的市場，沒有關注當代藝術的美術館，藝術學校不多，藝術行業的機會亦少，但是現在很幸運，基礎架構開始成形，培養了很多年輕藝術從業者。我們也有這個位處於中環的美術館，是與公眾積極溝通的平台。」譚雪認為，現在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剛畢業的學生也有很多機會。「我喜歡在香港工作，因為這裡有一種公平競爭的氛圍，相比其他亞洲城市是最好的。在大館美術館，我們期望可以為藝術家的創作提供最佳環境。」^B

方由美術創辦人 徐錦熹

從小到大，師隨楊忠全學畫的徐錦熹一直醉心於水墨畫，本來想在大學唸美術或建築，但父親不支持，她唯有選修心理學及經濟學。畢業後投身銀行界，做得有聲有息。入讀全球頂尖的美國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 (Kellogg Business Schoo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的工商管理碩士要求是年薪25萬美元，當時她30歲未到已經達標。有一日，教授問：「即使輸掉所有錢都不緊要，只要贏了過程，享受一切，你最想做什麼？」徐錦熹突然想起她的藝術夢，人生很短，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於是銀行家搖身一變成為賣畫的女孩。

十年間，憑藉許鴻飛的「肥女人」賺了第一桶金，然後再將中國新水墨帶到國際舞台，大放異彩。方由美術亦由原本在中環善慶街的舊址，於去年進駐中環的H Queen's，在國際畫廊林立的香港，將具有東方氣息的當代藝術，向全世界重新呈現。

「當時做水墨畫是因為自己很喜歡，根本沒有計算成▶



向世界展現東方藝術

◀本。因為之前做了許鴻飛『肥女人』的雕塑非常成功，它很容易與觀眾有共鳴，同時許鴻飛的技術非常好，他中學時已在做蘇派的雕塑。而他的藝術品，毋須多解釋，看的人就會立即表達反應，小朋友看到他的作品，說都不說就跑過去吻她一下，他是非常成功的。」徐錦熹賣「肥女人」賺了第一桶金後，就做水墨畫，藝術家們當時仍未畢業，非常年輕，她也沒有考慮太多。「他們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又利用山水畫石的方法去畫人臉。是非常特別的事，這些都並非追潮流。因為當你追得上一個潮流時，可能剛好就過去了，」她分享道。

方由美術的女性藝術家比其他畫廊較多，比重幾乎一半，而且都很受歡迎。「有些人以為我們專營女性藝術家，例如今日這個展覽上，一共有5個藝術家，當中有兩個是女性藝術家，但大家很容易挑選出(single out)女士出來，忘記了我都有男性藝術家。當然，彭薇、徐華翎是很有名的，但姜吉安也很有名啊，大家偏偏記不住，只記得我的女性藝術家，」徐錦熹笑著說，「當然，我們的女性藝術家比重是多的，你問我原因，是因為我與她們合作得好，可能我作為女性開畫廊，可以了解到她們的理念，可以分享得到，自然做得好。」

但方由美術沒有特別利用這個主題作為標籤，因為徐錦熹覺得如果自己不想被單獨挑出來，就先不要自我標籤。「但我們為我們的女性藝術家感到驕傲。例如徐華翎本身就很漂亮，並且將工筆畫變成另一種少女的甜蜜情懷，在台灣、中國大陸被廣泛收藏，很受歡迎。」徐錦熹說。

有趣的是，有男藝術家竟然因此感到尷尬。「有個藝術家甚至跟我說，有人告訴他，方由美術專做女性藝術家，你是男人為什麼與方由合作？他當下感到有點尷尬。我就問，為何你會覺得尷尬？這其實並非一件壞事。」徐錦熹很想讓大家看到，他們有女性及男性的藝術家。「除了藝術品，我們都會在社交媒體上介紹一下我們的男性藝術家。我們有男有女，很平衡。」

由銀行界轉投身藝術界，在男多女少的行業裡，徐錦熹似乎從未遇過因為性別而帶來的阻礙。「但有趣地，反而我們女性就有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己覺得自己有不足的地方，反而令自己做得未夠好。」徐錦熹舉了一個例子：「我是一個職業媽媽，非常寵愛我的小朋友，他們是一對龍鳳胎，現在已經9歲。他們剛出生時真的非常可愛，我除了在自己的Facebook、Instagram上分享畫作外，亦會忍不住放一些家庭照，因為實在太開心、太想與大家分享。但我曾經收到一位女性藝術家的電話，她說：『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你會否考慮將自己的家庭生活與事業上的生活分開？』」徐錦熹問：為什麼？事實上，那位藝術家較為年長，在她的年代可能受過別人的指點，有過不愉快的

經歷。「如果我故意要避開分享家庭生活的話，我不是很不快樂嗎？為什麼我要建立一個『女強人』的形象？我不在意我是否一個創業家或者母親，抑或是一個『大媽』，我就是一個完整的『我』。我本身就是要不斷同時應付我的家庭、事業。」徐錦熹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全面的自己。

在藝術的表達上，女性纖細的特質與東方的藝術非常配合。「我們東方的藝術及哲學，非常講求敏感度及詩意。雖然中國歷史上的畫家文人主要是男性，但女性亦可以做得好好，女性的切入點可能更加細微，形成的作品就很高質素。例如彭薇利用水墨在手上畫錶，去懷念她的好朋友艾未未。她每日在手上畫一隻錶，是很好的作品，」徐錦熹說。

其實不分男女，好的藝術家就是好的藝術家。徐錦熹在挑選合作的藝術家時，亦有一套準則。「最大的標準，就是看那個人本身。這與我過去做銀行的經驗有相通之處，你看一間公司，一定要看老闆及管理層，而藝術家的發展潛力都是一定要看藝術家本人。我不單單是買一幅畫，而是要將整個藝術家的概念表達給客戶。我要肯定藝術家必須是專業及有潛力。我們不會做業餘藝術家，並且要與我溝通得好。」徐錦熹分享，至於潛力，就要看藝術家的思維模式，「他如何去處理，他的觀察力、分析力，如何表達，有多相信自己所做的事，都很重要。」

因為當代藝術的收藏家的需求及要求較高，他們對於藝術家的要求，並非單單在於視覺美感的表達。徐錦熹解釋：「例如客人會將藝術品放在不同的地方，希望藝術品會帶來靈感、動力，令自己有新的視野。收藏家的口味非常廣闊。如果只著重於呈現美感而沒有主見的，是不可行的。」

面對大批國際畫廊相繼進駐，方由美術作為本地畫廊仍然站穩陣腳，去年由上環遷進H Queen's，源於其鮮明的個性及品味。「我們的主體是以東方的角度出發，這是一個獨特性，我們希望做到很國際化，但以東方的方向做，相信你會很難想像由西方的畫廊去做東方的藝術。即使我們邀請西方的策展人或藝術家，都會揀選有研究東方藝術的，令我們整個發展有一個持續性。」徐錦熹利用美食形容方由美術的強烈風格，「我們很想強調本土性，但亦要有國際性。例如在家煮飯，做一隻豉油雞，但用了澳洲蜜糖、香港豉油、中國香料、意大利香草，香港人的本土性在於，我們有本土的味道，但不局限於本地的材料。又例如，我喜歡食蒸魚，但用了意大利的蒜頭，我們有東方的口味，但亦很擁抱西方的影響。因為我們想在不同的地方找到最好的東西。」事實上，方由美術亦有來自瑞典、美國等地的藝術家，未來徐錦熹希望有更多台灣、香港、日本、韓國的藝術家，不斷嘗試以新的方法去做具有本土性的藝術。●

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 聯席總監

高橋瑞木與 張晶晶

高橋瑞木 (Takahashi Mizuki) 與張晶晶 (Chin Chin Teh) 很忙。她們一起帶領的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 (CHAT 六廠) 即將在今年春天開幕，作為南豐紗廠保育項目的一部份，CHAT 六廠將策展多元化項目，包括展覽與共學計劃，邀請參觀者感受香港紡織業勇於創新的精神。在3月17日開幕的展覽「掀起生命的布局」為CHAT六廠揭開序幕，兩人每天都在確定宣傳海報的質量、布展進度，從南豐紗廠的這一頭跑到另一頭。

高橋瑞木是「掀起生命的布局」的策展人，她說，這個展覽邀請了17位來自亞太地區的當代藝術家與創作單位參加，他們分別以紡織作見證，敘述現代歷史的含糊事實、社會政治的背後動機，以及高速全球化下紡織勞工的個人及集體經歷。張晶晶補充，CHAT六廠不僅僅將紡織當成一種物品，紡織還是一種隱喻。「我們透過當代藝術家的眼睛，看見被遺忘的人。」

像是紡織可以為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發聲。生於菲律賓紡織世家的艾瑪 (Alma Quinto) 是一名文化工作者，也是當地知名的教育家及視覺藝術家，去年她參與CHAT六廠的駐場藝術家計劃，在香港待了3個月，與菲籍家庭傭工合作創作能代表自己的小布偶，放▶

高橋瑞木(右)與張晶晶(左)



編織
多元文化
新地標

◀ 置於中環皇后像廣場銅像下。

「皇后像廣場每逢周日都是外傭休憩的地方，在這裡佇立的銅像幾乎都是男性，像是銀行家貝臣爵士（Sir Thomas Jackson），他們是富貴與成功的象徵，但是家庭傭工為香港的家庭付出，也是英雄，她們卻常常被視而不見，」高橋瑞木解釋。

艾瑪透過布偶創作讓創作者發問：我是誰？我只是一個家庭傭工嗎？我希望能成為怎麼樣的人？最後這些布偶有各種樣子。曾獲《國家地理會德豐青年攝影大賽》獎項的Joan Pabona創作了一個背著相機的布偶，她想要成為一名攝影師。自認為跨性別的Marrz Balaoro要求艾瑪為他做一個男性布偶，在它頭上縫上大大的「Transgender」一字，Balaoro後來組織了同性傭工支援中心。

紡織物有千變萬化的表現，在公共領域下也可以是宣揚政治理念、漆上標語的橫幅。龐克搖滾社是來自馬來西亞沙巴州的藝術團體，由一群藝術家、音樂家及社運人士組成，他們常常在迫遷場合中，透過音樂與印在布料上的版畫去驅動社區力量。

張晶晶說，「掀起生命的布局」多元而包容，這是CHAT六廠一直提倡的中心思想。她說，在紡織領域，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女性」的工作，但實際上在技術部門中，很多機器都是由男性操作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這是某種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我們試圖打破這些界限，展現包容性，因此，我們不強調性別，而是試圖推動人們擁有的那種假設，讓紡織品成為所有人都可以探索的東西，無論你的背景、性別是什麼。」

作為一個十分年輕的機構，張晶

晶表示，CHAT六廠擁有高度自主權，創造包容的環境。「我們有一個相對精煉和充滿活力的團隊，這對多元性真的很有幫助，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相對一些建立了更長時間的機構，他們可能有更系統化與傳統的做事的方式，要改革並推動多元十分困難。」

張晶晶認為，談藝術領域中的性別平等不應該是黑白分明的「男性VS女性」，女性主義應該包容更廣大的思考，為所有藝術中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發聲。「在今天的世界裡，如果你是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高度社會聯繫的女性，也許你不是那麼弱勢，但如果你是一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男性，你可能反而是弱勢群體。所以我認為，我們試圖解決的不是以性別來區分觀眾，或者按性別劃分藝術家、工作人員，而是無論你的種族、性別、教育背景是如何，我們都給予平等機會。」

張晶晶說，用一句話來總結CHAT六廠的理念，是為所有人編織創意體驗（weaving creative experiences for all）。「編織是紗線在各個經緯的結合，它們可能具有不同的顏色、紋理、特質，但我們必須將它們編織成面料，CHAT六廠就像是這樣的一個角色。」無論是訪客還是藝術家、年長或是年輕、對藝術和紡織了解得深或淺，大家都可以在這裡相遇。張晶晶也希望CHAT六廠不只是一個人們去尋找新想法的地方，而是讓到訪CHAT六廠會變成大家的習慣。「很多時候人們去藝術中心都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你觀看藝術作品，但途中不會經歷任何創作過程，我們希望改變這一點，因為所有事情都應該是多元而且沒有階級的，這是我們一直貫徹的理念。」**B**



佩斯畫廊高級總監

Whitney Ferrare

擴闊光譜的畫廊



藝術界內，男性除了在人數取勝外，男性藝術家作品的價錢亦往往超越女性藝術家作品，這個現象涉及整個生態上女性藝術家的能見度，為了扭轉這個趨勢，過去為香港帶來不少新面孔的佩斯畫廊（Pace Gallery），不斷嘗試增加藝術家的多元性。本月底，佩斯畫廊為於1950、1960年代在「光影與空間運動（Light and Space movement）」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藝術家Mary Corse進行亞洲首次個展，讓這位過去往往被同期男性藝術家的光芒所掩蓋的女性藝術家，在世界重新展現其對

光影作品的細膩觸感。

除了Mary Corse外，佩斯畫廊與女性藝術家的合作由來已久。「佩斯畫廊由第一日開始已對不同時代的藝術作品推行包容性強的方針，不論是20世紀或21世紀的女性藝術家，由Agnes Martin、Louise Nevelson，以至去年開始合作的三位女性藝術家：Arlene Shechet、Mary Corse及Lynda Benglis，我們並非特別刻意地要挑選女性藝術家，我們只是承襲創辦人Arne Glimcher及Milly Glimcher在1960年代一開始創立佩斯 ▶

◀ 畫廊時的原意及宗旨。不單是藝術家，我們的員工組合都很多元性，由初級員工以至管理層，都包括了不同性別、國籍。」 Whitney Ferrare 娓娓道來。

近年有股討論性別平等的潮流，不論是大型的藝術團體、畫廊，都開始關注性別平等這議題。Whitney Ferrare 認為這發展很令人鼓舞，但太強調藝術家的性別時，反而令大家忽略了藝術本身。「最重要的，仍然是藝術品本身。我們不想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去標籤男性藝術家或女性藝術家，他們就是『藝術家』」。

性別的不平等並不單存在於藝術世界，不論是科技、科學、管理高層等範疇，女性的比例亦較少。雖然女性藝術家的數目不斷增加，但男性及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價格差距仍然頗大，這個現象，歸根究底可以怎樣去處理？「主要是在整個藝術界的生態系統內，對於女性的支持及鼓勵仍不足夠，不論是藝術院校、畫廊、拍賣行以及藝術館，令市場對於女性藝術家的需求仍然較低。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但透過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並且共同努力去支持女性藝術家的事業發展，會有重要的幫助。近年，有關不平等的意識不斷興起，並對於過去被忽略了的女性藝術家如 Mary Corse 的重新關注及欣賞，令這個情況慢慢地作出改變。Mary Corse 在香港舉行亞洲首個展覽，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當然我們需要不同的畫廊、藝術館、策展人、評論家，以及整個社群去共同努力。」

對 Whitney Ferrare 來說，畫廊現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令大家不要將藝術品單單視為投資。「近年來，藝術界慢慢地變得金融化，這個趨勢影響到女性藝術家在這個界別中的能見度。很多人由金融投資的角度討論藝術，但並非藝術品本身，那並非藝術品的真正價值所在。畫廊希望大家將焦點重新放在藝術上，這亦是我每日需要做的工作。好的藝術品並不一定價格高昂，最重要的是藝術品與觀眾的個人聯繫，這個聯繫因人而異，但需要親身去感受。」

佩斯畫廊將在紐約開辦一個圖書館，希望大家重視藝術

知識、藝術家，以及藝術品。「當你走進我們的畫廊，第一眼就會看到這個圖書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作為畫廊，我們希望大家走進來，看整個展覽、去心領神會。你無法單單透過一本拍賣品合集去感受藝術的。」

現在香港正在經歷第二波的畫廊進駐潮，作為佩斯畫廊的高級總監，Whitney Ferrare 感受良多。「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在仍是嬰兒的時候已來到香港。香港的藝術界現正經歷一個文藝復興時期，正向著樂觀方向發展，可以看到很多國際畫廊投資於本地的藝術界。不論是在零售方面，抑或在整個城市舉行公開展覽。在政府的公共層面，我們亦看到更多如大館的空間，它絕對是一個『game changer』（改變遊戲規則者），位於中環這個核心地段，我仍然記得小時候，仍會看到那裡的警察將剛洗好的衣服晾出來。現在，那裡已經在舉辦很多很高質素、具有挑戰性的展覽。現在他們正在做一個《性別的暴力》的展覽，由來自德國的策展人進行策展，可以看到賽馬會對於藝術支持的增加，這在香港是前所未見的。今年年底香港藝術館將會開幕，另外更有 M+ 進行全年的展覽，令人非常期待。」

佩斯畫廊在亞洲已經有 10 年歷史，過去一直都為這個城市帶來前所未見的藝術家。「今年夏天，Leo Villareal 將會首次展示他部份的裝置藝術『Illuminated River』。Loie Hollowell 亦會在亞洲推出首個展覽、Mary Corse 亦將會有首個亞洲的個人展覽，她去年底剛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舉辦回顧展。」

有些評論指出，隨著外國畫廊的進駐，本地畫廊的生存空間反而受到影響，Whitney Ferrare 不以為然，「整個城市對於藝術的興趣大大地增加，當然包括了本地及國際的興趣，我希望任何展示藝術的渠道，不論是非牟利，如 Para Site 的展覽、亞洲藝術文獻庫 (Asia Art Archive) 的學術計劃，我希望都會自然地將本地藝術家包含其中。如果你看看 Blindspot Gallery、Gallery EXIT，以及 Empty Gallery，這些都是很出色的本地畫廊，絕不遜色於紐約、倫敦的畫廊。」 B

畫家高天恩

爭取性別平等時 也要直視歷史

高天恩 (Celia Tinyan Ko) 的工作室位於火炭，因為春天濕氣重，所有的油畫作品都用棉被一樣大的布蓋著，為了訪問拍照才掀開。站在這些油畫作品前、看著上面的人臉肖像，一瞬間有畫中的人物好像在移動的錯覺，高天恩說：「肖像畫是關於存在感，畫中人物的移動好像在告訴你些什麼。」

高天恩在美國加州州立長堤大學主修繪畫，回流香港後，成為第一個將美國南加州社區公共壁畫概念及技術引進香港的藝術家，過去曾領導多個公共壁畫項目和學校教育壁畫項目，在石硤尾白田邨、藍田德田邨都能看見她的作品。大約十年前，高天恩將她的藝術表現形式轉往油畫，「我對描繪人類的存在開始產生濃厚興趣」，她的作品裡光影搖曳、後來成為她為人所知的一種風格，作品也被香港藝術館收藏。

高天恩喜歡畫大型肖像，其中一個正在進行的系列叫做 Red Fruit Rhapsody，主題是關於挑逗。「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人的慾望，畫中的男女如何挑逗這個年輕男生，以及我作為一個畫家如何挑逗你，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富概念性的了。」

創作之餘，高天恩也教繪畫。臉書上看見她教人體速寫的紀錄照片，問她繪畫中有沒有男性凝視 (male gaze) 的問題，高天恩突然變得激動地說：「性別平等很重要，但我們不能總是用文化研究的眼睛去看藝術。」

高天恩是了解文化研究的，事實上，她為了「深入敵營」，了解「別人到底用什麼框架套在藝術作品上」，在前幾年報讀了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文學及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很想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高天恩認為在爭取性別平等的同時，也應該擁抱歷史，而不是為了追求性別平等而將過去的一切全都剷除。「你不能夠用另一個學科的理論將它全部拆除。我明白大家的女性主義立場在哪裡，像是 Judy Chicago (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我真的很尊重她，她做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還有我以前做實

習的地方，創辦人是三位女同志，有這麼多令人驚歎的女性藝術家。」

對高天恩來說，好的畫家不應分男女。「我最尊敬的其中一位老師曾經跟我說，畫家就像是一個水管工人，我們修理東西，它是骯髒的工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我們追求的東西和理念在其他人眼裡看來可能很浪漫，但對我們來說那是真實、現實。特別是你正在寫生的時候，寫生是最直接的，有情慾在裡面，你透過眼睛撫摸眼前的對象，你的眼睛週圍望，思考該怎麼畫。這對我們來說是真理，但是人們不會談論真相。」

在繪畫的領域中，高天恩也見證過藝術家會因為性別而有不同的待遇。高天恩現在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擔任老師，過去曾任教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香港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藝術學院、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系，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她說，在教學的過程中曾經目擊過一些男老師性騷擾女學生的事件。「在藝術界，這樣的事件多到你不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特別是在藝術教育的領域，因為老師與學生的關係有點像是偶像崇拜，你會仰慕你的老師。很多學生看著一個老師，會覺得他有地位，他是『藝術家』。藝術很容易讓你有幻想，老師呈現出來的是一個藝術家的形象，他刻意地經營這個形象，而學生接受，而這個高高在上的形象，男性的呈現是較容易、也多過女性的。」

從事藝術創作近30年，女性這角色不能說沒有限制。「我的情況比較多方面，除了性別之外，大家還覺得我『看起來不像一個藝術家』。在唸書的時候，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你比較不會遇上性騷擾事件。但如果你是一個女性，人們會辱罵你，就像是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沒有人敢叫奧巴馬『黑鬼』，但每個人都罵希拉莉是個『婊子』一樣。只要你是一個男人，有時候你就已經贏了最厲害的女人了。」**B**

瑞銀財富管理 大中華區主席 盧彩雲

超級女富 最強藝術

在亞洲，每個星期就會冒起三個新的億萬富翁。在2017年，區內的女性億萬富翁就增加了20%；在2005年至2017年間，這個數目上升了20倍。這班「大姐們」不僅懂得賺錢，更懂得享受生活中的各種美好事物，往往在女性藝術家作品中找到惺惺相惜的共鳴。沿襲歷史發展的軌跡，富有的社群造就興盛的藝術；慢慢地，富豪「大姐們」的需求，帶動著女性藝術家相繼崛起。

每天都與億萬富豪「大姐們」打交道的瑞銀財富管理大中華區主席及主管、瑞銀香港區行政總裁兼瑞銀集團董事總經理盧彩雲，觀察到亞洲藝術市場近年的變化，不斷透過當代藝術，與這群「大姐們」建立連結。

「我們在香港與Art Basel已合作了第六年，在全球的巴塞爾藝術展合作已達26年，而瑞銀作為藝術品收藏家已有60年，在全球擁有超過三萬件藝術品，這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看到客戶對於藝術的興趣不斷上升，所以我們在全球一直在做藝術相關的活動，」盧彩雲分享。而藝術就成為了銀行與客人交流的平台，過去一向不熱衷於參與聯誼活動的客戶，亦專程向她索取Art Basel的入場券。瑞銀亦於Art Basel期間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我會主持一個藝術藏家的晚宴，來自全世界的重要收藏家都專程來到香港，」她說。Art Basel的入場人次，亦由2017年的7萬，上升至去年的逾8萬。「而且，我們看到很多女性，女性的參與率由過去25%上升至33%，女性藝術家亦增加至38%，我們看到更多的多元性。」

瑞銀將於貴賓廳擺放40件Ed Ruscha的作品，不少客戶專程飛來香港看Ed Ruscha的展覽。「我們主要著重於當代藝術，因為它可以為我們現在這個複雜、難以預測的世界中提供了洞察力。以及當中的創作力，亦將我們與客戶聯繫起來，我們常常討論對於作品的看法，以及它與現實生活中的對照。」

亞洲市場的買家越來越多，正因為亞太區的富豪人數正急速上升，而女性富豪亦成為了女性藝術家作品的重要買家。「我剛與一位女性億萬富翁吃早餐時討論藝術。現在亞太區的女士除了工作之外，亦很懂得欣賞生活中的美好，努力打造一個平衡的生活。女性富豪身處於同一社交圈子，喜歡結伴參與各種活動、嗜好，」盧彩雲說，「很有趣的是，不論經濟好壞，女士都有很強的購買慾。雖然女士一向都精打細算，但往往購

豪成為 買家

物決定都很受到當下的興致推動。」

盧彩雲又指出，女性富豪在觀賞藝術品時，往往對女性藝術家的創意及思考過程更有興趣及共鳴，找到與自身的聯繫，這個需求令女性藝術家不斷增加。「如果看我們的億萬富翁調查報告，亞洲現在是一個億萬富翁的集中地，區內有814個億萬富翁，每星期崛起三個新的億萬富豪，其中兩個來自中國，三分之一是女性，女性億萬富翁的增長速度很快。」

而區內的財富轉移，亦是造就女性富豪的另一個原因。「現在，亞洲正在經歷一個世代的轉移，現在看表面是男性主宰財政決定，但當財富轉移一出現時，例如父親過世，很自然地，財產就落在配偶身上，」盧彩雲說，故此，瑞銀非常著重於對女性的教育，希望她們在接手財富時不會感到徬徨及不知所措。「未來10年，我們會看到有很多由第一代去到第二代的財富轉移，」她說。

雖然世界各地的不同行業都存在男女失衡，但香港的情況相對理想。在銀行業，「亞洲區有40%是女性、亞太區財富管理團隊高達60%、高級管理層多達40%以上，亞洲對於性別平等非常著重，」盧彩雲說，她是女性行政總裁網絡（Women CEO Network）其中一個創辦人。事實上，香港有很多女性行政總裁，「我本身是香港的行政總裁，另外花旗、匯豐、渣打的香港行政總裁都是女性。近年亦有很多數據指出，如果企業著重男女比例平等的話，對於盈利亦有幫助。因為我們最後都要著重成果的。」

歐美與亞洲出現很大分別，最主要是環境因素。「我最初入行時，有些與我同期入職的歐美女同事，她們都已經退出這個行業。在亞洲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有可負擔的家庭傭工，為我們分擔家庭的事務，在你的生命週期中出現轉變，例如有了小朋友之後，他們可以幫忙。」然而，當年一同入行的歐美同事，因為無法找到可負擔的家庭傭工作支援，被迫在產子後留在家中，無法再為自己的事業打拼。「我們要做導師（mentor）去鼓勵、幫助女性更加進步，整個環境就會有更多有關女性的倡議（women initiative），但如果一些女性管理層比例不高的環境下，就很難形成這種倡議。」盧彩雲說，瑞銀鼓勵女性在生育後重返職場，在公司開設了育兒室，方便她們舒適地工作。B

The Fabrick Lab 創辦人吳燕玲

推開吳燕玲（Elaine Yan Ling Ng）工作室的大門，五顏六色的絲線在天花板上吊著、在椅子上擺著，房間的盡頭還有一台大型的紡織機，工作時發出低低的噪音。

吳燕玲與編織的緣份開始得很早，由外婆進門，小時候就開始做一些編織遊戲，她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直到一頭栽進物料的世界。吳燕玲覺得自己是材料的魔術師。在英國聖馬丁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她研究智慧紡織品，進行各式各樣的物料實驗，希望將編織與科技結合，做出模擬大自然反應的材料。吳燕玲說，物料的定義非常廣闊，可以是柔軟的、硬挺的、彈性的、流動的、變化萬千的。「我將抽象的概念應用在設計上，希望設計能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

吳燕玲曾與許多國際大型設計公司合作，包括施華洛世奇（Swarovski）水晶、日產汽車歐洲設計中心以及諾基亞北京設計中心等，作品也曾於英國倫敦、加拿大多倫多、意大利米蘭、法國巴黎、台北等地展出。吳燕玲說，大家常常覺得編織是「女性的」，但她一直致力打破這個二元對立，希望運用科技擴充物料的想像空間，跨越性別與紡織設計的界線。

智能紡織品是個很有趣的概念，你為何會對這主題有興趣？

仿生物科技（biomimicry）是我非常喜歡探討的命題。大自然中有許多奧妙的運作機制，它們已經存在非常久了，像是水母如何變得透明、羽毛為什麼擅於絕緣、蒲公英如何防水、動物如何改變顏色來形成保護機制等等。隨著當前氣候暖化，大環境有許多改變，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對我來說，解決問題的方法存在於了解現有的機制再創造新的組合，從結構中學習，例如我們可以從大自然中獲得靈感，製造出吸濕排汗的布料，想出方法讓細菌不會停留在身體上，或是像是運用在食品上的標籤，當食物離開冰箱一段時間之後，標籤的顏色會隨著氣溫變化，提醒大家食物的保存期限到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紡織品如此有趣，因為它不只是編織紗線，你還能結合各種不同的方法。

多數人認為編織是一種手工藝，在你的作品中，編織如何與科技結合呢？

編織其實是很「數學」的，你可以編程，精確地控制材 ▶



編織 不是 女性的 代名詞

◀料的使用與擺放位置。在這個層面上，我意識到紡織品不僅僅是時尚的一部份，它也可以應用在室內設計和可穿戴產品上，作為物料設計師，我過去的製作不但包括布料，也將技術運用在汽車的合金和手機設計上面。

我與瑞銀集團合作設計的藝術互動裝置《Nexus》便是科技與藝術的結合。這件作品探討的是全球空氣品質議題，瑞銀實證實驗室(UBS Evidence Lab)透過人工智能與數據挖掘，蒐集了全球逾8000個空氣品質監測站的大量數據，但這些數據躺在一個非常龐大的Excel文件中，很難與受眾溝通。於是我們將《Nexus》做成一個樹根形狀的互動藝術品。樹根是一個網絡，它們能夠溝通，就像是空氣污染數據是人類活動足跡的結果一樣。《Nexus》通過3D打印製成，表面塗層以紙與金屬紗手工編織，觀眾再選擇時間與地點之後，可以根據選擇的數據集來創建他們自己的燈光藝術品，將無形的數據轉化為視覺體驗。根據選擇時間與地點的不同，出現的燈光藝術也會不同。

能否談談你在貴州與當地婦女的合作？

幾年前我開始到貴州與當地婦女進行交流。貴州擁有絕佳的傳統紡織技術，但是隨著人口外移，傳統習俗出現了大量斷層。當一個村莊的人口下降到一定比例時，政府有權重新安置村莊的居民到新的地方，他們將永遠失去傳統的生活方式與驕傲。所以在貴州，我們思考的是如何保存貴州的傳統，同時吸引村民回到自己的村莊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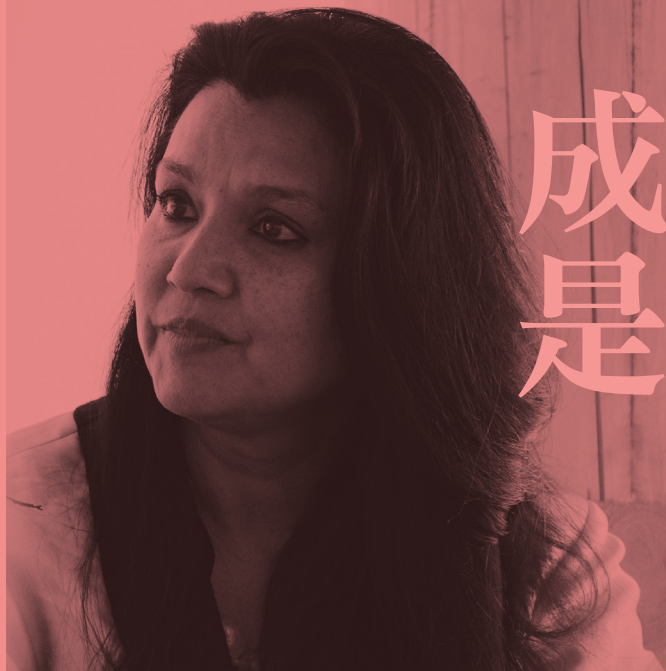
為了保存紡織的傳統，我與當地村民和婦女合作，他們按照代代相傳的方法製作織品，我們則提供現代物料，引進精品的設計思維，讓富民族色彩的手工藝跟時尚接軌，希望創建一個新的、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發展生態系統，令貧窮的婦女可以自給自足，在家庭勞動上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最終令他們在文化認同或經濟上受惠。

性別在工作上帶給你任何優勢或限制嗎？

有時候因為要做大型的作品所以要去一些工廠，工廠裡幾乎都是男師傅，一去大家都會看輕你，覺得你這個小女生真的懂嗎？尤其我的樣子又很女性化，很嬌小，所以我要跟他們講得很仔細，還要露兩手，展現出你是有能力的，他們才會尊重你，才會信服。但作為男性你不會需要特別證明自己什麼。其實作為女性，我不認為對我在工作上有任何阻礙，表現也不亞於男性，畢竟最重要是你的能力和心態。我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我覺得雖然我看起來很嬌小，我的身上卻同時有男性跟女性的特質存在，我可以同時是漂漂亮亮又是很強壯的。B

成功的定義 是帶來轉變

M+博物館館長 華安雅



M+ 博物館館長華安雅 (Suhanya Raffel) 在斯里蘭卡出生，14歲跟著家人移民澳洲，隨後在當地修讀藝術相關科目，從此踏上了藝術之路。在眾多藝術種類中，華安雅偏愛亞洲當代藝術，「我喜歡它的多樣化與不斷演變的特性」。在經歷了悉尼新南威爾士藝術博物館副館長，與布里斯本昆士蘭藝術博物館、現代藝術博物館高級策展等崗位的歷練之後，她來到香港，成為M+博物館館長，她說：「我們要將M+打造成世界領先的視覺文化博物館。」

M+ 主打視覺文化，重點展出20及21世紀的藝術、設計與建築和影像，主要大樓在2020年才會啟用，但華安雅說，M+的展覽工作早已展開，也從未間斷，「我們一直是一座沒有牆壁的博物館。」她指出，M+的策展團隊一直通過在不同場地舉辦大大小小的展覽，融入社區、與香港人進行對話，「我們希望讓藝術品跳出博物館的框架。」

M+過去曾經舉辦「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展覽，也曾進行「M+ 放映：性別流動」，能否聊聊你們如何將性別元素帶進博物館？

亞洲的視覺文化非常豐富。在香港，流行文化是大眾非常感興趣的東西，設計、時尚、音樂都聚集在這裡。1980、1990年代的香港樂壇創造了無數紅透亞洲的粵語歌手，電影工業發展更位列全球第三，促使了大膽創新的性別形象得以在舞台、電影和印刷媒介中呈現，「曖昧」從嶄新的角度探索香港流行文化，拆解性別定型與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流動」則是透過放映會，讓觀眾看見當代流動影像藝術家和電影製作人如何表達自己的流動性別身份，破除傳統的二元對立，以新的方式去呈現「性別」這個概念。多元性對香港非常重要，我們身處的地區複雜、多層次、多面向、開放、有趣，從香港這

片土地上所說的語言和它的歷史就能看出來，多元交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也該好好把握它。

在你的經驗裡面，女性容易因性別而遇上職涯天花板 (glass ceiling) 嗎？

M+的執行團隊裡有一半是女性，高級職員中有75%是女性，包括我們的董事會成員，每一位都是因為她們為M+帶來了貢獻，擁有特殊技能才被錄取。招聘上的性別平等並不困難，你只需要將它列作優先事項。當我接受我的職位面試時，面試官都是男性，但是他們最後決定任命我，這已經是某種賦權。我們需要共同努力，一起進行這個旅程，這是沒有盡頭的旅行，它一直在不斷發展。我們需要認識到賦權的必要性，對男性或是女性都是，為什麼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在談論性別平等問題，這意味著我們不夠努力。我們需要讓更多的人對它更加警覺，同時確保人的能力、而不是性別會在職場上受到認可，並放在前面。

你對M+的願景是什麼？

我的目標是讓M+成為能與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巴黎的龐比度中心 (Pompidou Center) 和倫敦的泰特現代藝術館 (Tate Modern) 等當代藝術標誌性機構相提並論的博物館。香港是排名在紐約之後、全世界第二大的藝術市場，隨著M+附近其他藝術場所的開設，我們希望香港能成為亞洲的文化之都。所以當人們問我，成功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我都會回答成功是帶來轉變，不管是在性別平等或是將香港打造為亞洲的文化之都上。任何的轉變都需要時間，途中你可能要停下來休息一下但你不能放棄。女性有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我們不能放棄溝通，要讓聲音被聽見。📍